

从遗产到资源

—中国西部人文资源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方 李 莉

一、研究的缘起

2000年，为了平衡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国家推行了西部经济大开发计划。在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国家也关注到了西部不仅是一个自然生态多样性和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也是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和人文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2001年，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人文资源，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牵头，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西部地区的四十个院校及研究机构的184名学者，成立了“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课题组，在国家科技部立项，这是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另外，为了加强实地调查研究及理论总结工作，还成立了“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家重点课题，通过文化部立项。这两个课题均由中国著名的社会学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担任课题总指导。两个课题，一班人马，研究任务有部分重合，也各有侧重。

二、研究的成果

两个课题历时七年，通过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深入到西部各地所做的数据采集工作，完成了“西北人文资源基础环境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另外，完成了73篇实地考察报告，编辑为五本报告集；四本考察笔记；三本论著，共400多万字。其中，《从遗产到资源——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为课题总报告书，是课题组在完成了数据库和考察报告、考察笔记的基础上撰写完成的。

笔者作为以上两个课题的负责人，希望在本篇论文中将课题研究的主要方法、观点及思考，概括地表述出来，以供学者们作进一步研究时参考，也是对笔者在承担国家课题研究七年多来的时间里所做的研究的一个总结与交待。

三、有关人文资源的定义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人文资源”的名词有不少人在用，但在国内的文献资料中，我们还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专门研究与定义。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日本对“文化资源”的定义。在日本东京大学文化资源学专攻网站上，有对“文化资源”的定义，即“文化资源”是指为了解某一时代社会和文化所必要的贵重资料的总称，可以把它称为文化资料体。文化资料体包括建筑物、都市景观或传统技艺、祭祀仪式等有形和无形的东西。将文化资料体活用并资源化后可以成为“文化资源”。他们讲的是“文化资源”，它和人文资源有什么关系？我们认为，所谓的人文，就是人所创造的文物、文明，也就是人类的文化。因此，人文资源与文化资源基本同义，在使用中可以互换。

日本是亚洲国家中对人文资源认识最深刻，实践最多的国家。日本提出将文化财，即文化遗产进行活用，让其成为重振地方文化和地方经济的一种资源。其目的是将文化传统活态地保留在社区中，藉此恢复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再造农村社区新生活。这就是将文化遗产从静态转化为活态的过程，也就是说文化遗产不再只是一个前人遗留下来的死的过去，而是一个可以用来发展我们未来文化和经济的基础。这就是将文化遗产转化成文化资源的一个重要过程。

如果说日本的定义是将文化遗产活用后就可以成为文化资源的话，那么美国一开始就将遗产和资源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了。其将我们定义的文化遗产，直接确定为“遗产资源”(Heritage Resources)，也称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这是一个经常用来指一组范围广阔的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物、博物馆、历史海难和传统文化场所的通用术语。《考古资源保护法》(Archaeological Resources Protection Act)及其配套法规所定义的“考古资源”和《国家历史保存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及其配套法规所定义的“历史性财产”通常属于上述分类。¹

美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为了能够形成爱国主义的认同，必须用它短暂的历史和纪念物等来凝聚人民，通过保护文物遗产让一般民众认同美国的精神和生活方式。所以，美国早期的历史文化保护与爱国主义密切相关，这一内容成为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保护对象，如为自由和国家独立而牺牲的英雄的史迹，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的战场，名人故居等等。

美国在这里是将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文化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再度对文化资源保护和再利用问题高度重视。文化资源保护分为地方政府主导(Government-oriented)、私有非盈利型(Private Non-profitable)和市场盈利型(Estate Market Profitable)三类。²

在美国，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文化资源保护，而非联邦政府。发掘历史地区的动力，带动地方经济、刺激旧城房地产市场，复苏处于衰败中的历史中心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是许多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其在这里的概念和日本一样，文化遗产不再是一个静态的过去，而是一种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和复苏地方文化的资源。

我们认为，文化遗产之所以被当作人文资源来看待是人的认识扩展和深化的结果。文化遗产长期以来一直是从文化固有的意义上而言的，文化遗产是民众创造的结果，文化遗产是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遗产却被人们发掘到了资源的价值。当文化遗产作为资源被利用时，一方面，在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多样性发展越来越受到关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于是文化遗产开始成为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成为不同民族与国家人文精神的载体；另一方面，在后工业时代，非物质经济、符号经济、旅游经济等的兴起，使传统的文化遗产成为了文化产业开发的对象，

¹ Francis P. McManamon, 'An Introduction to Heritage Resources Law', in: Sherry Hutt, Caroline M. Blanco and Ole Varmer ed., *Heritage Resources Law: Protecting the Archeolog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9, p.1.

² See Weinberg N., *Preservation in American Towns and Cities*,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9.转引自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与历史环境保护的整体性方法》，上海科技出版社，2001年，第164~165页。

随即有了“文化产品”的概念。作为传统人文精神载体的文化遗产同市场的结合，让人们产生了许多疑虑，因为市场是双刃剑，其在开发和利用文化遗产时，往往会因为商业的需要，对其产生破坏作用。但如果我们只是机械的保护，不能给予文化遗产新的活力，新的意义，那么文化遗产就是静止的，没有生命力的。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给予它的定义是活态的，是需要我们去传承，甚至是需要我们去进行新的创造的。传承与创造会为其带来活力，但活力的所带来的可能会是一种变化，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体是不变化的。另外，要有活力就必须与社会的发展结合，在这商业化的时代只要进入社会发展就有可能被商品化。而商品化的后果往往会带来非物质文化的遗产意义的空洞化，形式的雷同化。我们如何去认识和理解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课题要研究和要探讨的。

七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自参与及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利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种重组和重构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了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因此，“人文资源”这一概念的出现，不是理论研究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客观存在，而理论只是在发现与总结。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语空间，促使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七年多来，课题组成员在西部的追踪考察，使我们亲自参与及感受到了西部民间文化的剧烈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缓慢的文化变迁，而是文化在各种内在与外在力量及权利交锋中的重组或重构，在这种重组和重构的过程中，西部的传统文化成为了各种力量和权力都在反复利用和开发的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中，其“资源”意义远远大于或超越其“遗产”意义。因此从“遗产”到“资源”，不是一种理论的研究，而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一种正在进行着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研究，还不能很清楚地辨别其利弊的社会实践。希望本课题的研究，能为学术界提供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话语空间，促使这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启动对本课题研究的促进

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中国政府启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这项工作的启动于进行，进一步推动了本课题研究，并使课题在研究中关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西部人文资源研究中的意义。在本课题的研究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西部的人文资源，构成这些资源的主要是西部的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对我们课题的研究内容有些什么样的启发，这也是我们在研究中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刘锡诚先生在他的《对几个“非遗”理论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写道：“通常，学界根据是否有文字记载，把中国文化传统分为有文字记载的“大传统”和以口传心授为载体的“小传统”两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就属于小传统

了³”。另外，郑培凯也在他的文章中写道：“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人类文化遗产，基本态度是‘文化环保’，是尽量保护各种文化传统（特别是小传统）的原生态状态，以免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在全球文化过程中逐渐消失⁴。”通过这些学者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扩展了以往传统文化的范畴，以往的传统文往往只包含有文字记载的精英文化或汉族文化，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中却包含了没有文字记载的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将文化保护看成是“文化环保”，而且在文化环保的过程中，人们也在大量的借用生物界和自然界的术语，从生物多样性借用来的文化多样性，还有从生物基因库借用来的文化基因库，从自然生态借用来的文化生态等等。同样，人文资源也是从自然资源借用过来的。在自然界我们一方面要保护自然生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将许多的自然物转化成自然资源，并利用这些自然资源为人的物质生活及精神生活服务，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向自然索取资源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中，人类创造了辉煌的物质文化，也在大量开采自然资源的同时，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生态。

当自然资源遭到破坏，物质文化消费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人们又开始寻求非物质文化的消费，也就是精神文化的消费，这里包括了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等。于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生态的保护，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人文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

然而，我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一方面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有了较长时间的认识与了解，我们已经开始明白了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也已经明白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必须的，但有时要有节制的，要关注其的可持续发展性和可再生性。但我们对于人文资源的认识却还刚刚开始，也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人们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造了丰富的物质世界。在未来的人类社会发展中我们将要进一步开发人文资源，利用其建造我们未来的文化，也不排除利用其开发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但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不同的地方是，当我们还来不及认识它时，它就有可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遭到破坏和遗弃。因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它，还必须保护它。在我们不认识它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破坏和遗弃它，但当我们认识到它以后，又有可能去过度地开发和利用它。就像自然资源一样，过度的开发和利用会造成自然生态的被破坏，而人文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也会造成文化生态的被破坏。文化的沙漠化，比自然的沙漠化更可怕，因为她涉及到的的是一个民族的所有人的灵魂。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所遭遇的特殊语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是从英语国家翻译过来的外来语，人们一方面感到很新鲜，另一方面也感到很费解。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地解析。如果我们将它放在中国的近代史中来理解，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名词虽然很新鲜，但其内容并不新鲜，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和时期，其表达的术语及语境不一样而已。如今天我们称其为“文化遗

³ 刘锡诚：《对几个“非遗”理论问题的思考》，《凯里学报》2008年2月，第26卷第1期，第13页。

⁴ 郑培凯主编《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不久前我们还在称其为“传统文化”，“活化石”，或“落后文化”，“旧的传统”，“保守势力”，甚至“封建迷信”等等。尽管有这种概念的人越来越少，但在思想上有这种残留的人还不少，以至于民间宗教到现在还始终是一个禁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问题至今还未解决。因为在历史上它除了有正面的形象外还有着反面的形象。

一般人的眼里，所谓的“遗产”是前代人的遗留物，是过去的在当代已不再发挥效用的，甚少不再完全发挥效用的传统文化。是旧的物品，旧的建筑，旧的街道，旧的习俗、旧的观念，旧的艺术等等。而这种文化是与旧的文明制度、旧的社会生活相匹配的。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工业文明是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这是一个比农业文明更先进更发达的文明，而现在已经到来或正在到来的后工业文明，又是一个比工业文明更先进和更发达的社会形态。所以当—一个群体或—个国家还处于农业文明时期，与其他已经进入了工业文明的国家相比较，就会显得落后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够。—一个经济不够发达的国家在世界上是没有话语权的，也没有竞争力的，因此努力发展工业文明，摆脱落后的农业文明就是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目标。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传统的文化观念，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技术，以全面的实现自己的文化转型。

中国在农业文明时期是一个大国、强国，但由于其进入工业文明较晚，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弱者，饱受凌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中国人当然不愿意成为落后保守的对象，更不愿意集体的成为过去时代的遗留物，因此，对于农业文明的一切都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对于老祖宗遗留下来的文化，不仅是不屑—顾，而且是急于摆脱。尤其是那些目前对于我们来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文化观念，文化习俗，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更是看不起。其奋斗的目标不是要将这些已落后于当时时代的遗产完整的保留下来，而是要集体从中突围，而到达—一个新的时代。于是，由五四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科技救国”、“实业救国”到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砸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除旧立新”、“破除封建迷信”等，就成了中国近—个世纪以来的最强音。

虽然现在的经济发展了，但中国地大物博，发展非常不平衡，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进入了后工业文明，但—些偏远山区或少数民族地区，却还仍然生活在农业文明之中。发展的不平衡也造成了对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不平衡。在大城市中—些受教育较高的群体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呼声很高，但在偏远的山村，在那些依然生活在农业文明的环境中的人群中，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实在是离他们的生活太远。尤其—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如何生存，如何摆脱饥饿与贫穷，像发达地区的人们那样过上现代化生活的问题。他们—心想着的是如何摆脱传统的，已经在现代社会中失去了效用的传统文化，尽早地融入到更先进的文化中，而不是如何保护传统的问题，有这样的想法不仅是普通的民众，也包括当地的领导干部。因此，在中国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的发展怎样才能同时兼顾？

六、课题研究的方式与目标

在研究中课题将自己的研究目标与当前国家所启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紧密结

合。并认识到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类已经有了几百年的经验和传统的方法，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还在刚刚探索保护它的有效方式。到目前为止有两种方法是被提倡的，一是用信息技术开展记忆工程，即数据库和数字博物馆的建立；二是鼓励传承、保持活力使之可继续发展下去。

而课题针对这样的情况，首先是建立《西北人文资源环境基础数据库》，将人文资源，概括为十个方面，即：人文地理资源、自然与人文景观资源、人口与教育资源、民族与民间风俗资源、民间音乐资源、民间美术资源、民间工艺资源、民间戏曲资源、民间舞蹈资源、考古与文物资源。框架的分类是从地理与自然、历史与环境出发，着重记录整理以口授心传为中心的活态人文资源。对西北地区地理与自然、历史与环境的介绍，主要表现在人文地理、自然与人文景观、人口与教育、考古与文物四个部分；而对现实中存在的文化艺术为中心的人文资源的介绍，则通过民族与民间风俗、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戏曲、民间舞蹈六个部分来介绍。这一研究一方面是对西部的人文资源开展记忆工作，另一方面也是遵循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摸清家底”，是对西部人文资源的一个面的梳理。

第二，课题通过大量田野考察和活生生的个案研究与剖析来认识和理解，西部人文资源存在的现状。并从中找出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方式。

第三，通过对西部已经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近距离考察与解剖，寻求如何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使之保持活力并可继续发展下去的合理方式。

七、西部人文资源所面临的状况

在中国的现阶段，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和受破坏的程度究竟如何，这是大家所关心的，也是本课题一直在叙述和讨论的问题。在研究中我们看到，任何文化的存在，任何人文资源的存在，都需要有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如果没有了这样的环境，它的存在就必然会受威胁，它的发展与传承就必然会受到阻碍。为此课题对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做了深入地研究。

（一）西部自然生态环境变化状况

通过文献的梳理及时地考察，我们看到西北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1. 天然植被大多消失殆尽。2. 水土流失不断加剧。3. 土地沙漠化扩大。4. 高山冰川雪线后退，冰雪储量减少。5. 河流湖泊水量减少。6. 绿洲萎缩。除这六个方面的问题外，还有一些生态环境变迁问题，如一些地方存在寒冻、冰雹、洪涝、鼠疫、蝗虫等灾害以及一些城镇与工矿区的“三废”污染等。前面的六个方面的问题不是今天才出现的，而是在历史上一直就有所发生，但在今天发展的速度更快了，而后面的一些现象有的是派生性的，有的则是近期才突现出来(如“三废污染”问题)。西南地区也大致如此，许多的原始森林都遭到破坏，有的几乎消失，一方面是历史的原因，另一方面与我们解放以来的各种政策也有关系，如我们当年大炼钢铁，无顾忌的砍伐森林，还有围海造田，围湖造田等等。另外，为了破除迷信，禁止民间进行祭山、保护神树林、祭湖、保护神湖等民俗活动。许多的民间禁忌我们看起来

是一种落后的“迷信”，但正是这种“迷信”帮助我们保护了许多的树林与湖泊与河流，甚至野生动物等，因此，在不少的民间文化中实际上包含着许多与自然相处的经验与智慧，但却被我们傲慢地破坏了，这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

西部的自然生态不仅是西部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也是产生其文化所依附的必要环境，比如，狩猎文化源于森林，游牧文化源于草原，森林没有了，草原沙化了，其文化还会如何存在与发展下去？因此，生态环境的改变，不仅威胁着西部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在威胁着西部传统文化的继续发展。

（二）西部人文环境变化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快了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步伐，西部传统的农业文明结构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许多偏远的乡村，修通了公路和架起了电线以后，传统的、手工的、农业文明状态的技术模式，开始被电动的、机械的、工业文明状态的技术模式所取代，虽然这些地方的机械化程度还不是太高，但其由传统技术所构成功能圈已开始解体。而技术所代表的不仅是一种劳动的方式，还是一整套的文化模式及社会结构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许多西部农村的年轻人为了追求先进的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纷纷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城市打工。在我们所考察的西部农村，几乎有百分之八九十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到城市打工，村子里剩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和孩子，还有一些妇女，乡村一片萧条和凋零。没有了人，没有了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如何传承？

（三）西部人文资源与民间文化的再生产

在当今的西部，其所面临的不仅仅是许多珍贵的人文资源的流失，更重要的是其民间文化在各种力量的交锋中，向我们展示着一幅重新组合和重新建构的图景。在我们观看这幅图景的时候，一定要认识到，文化像一张网络，我们要理解当代的西部民间文化，我们就一定要理解构成这张网络的各种路径。在考察中，我们注意到了其中几个重要的关键部分：第一是西部的人文资源，其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所需要加工的原料；第二是各种“权威”、“权力”的“力”的体现，这种“力”不仅是来自国家、国际、民间、市场，甚至来自学界，它们是西部民间文化再生产的重要动力；第三是西部的民间艺术，西部当代的民间文化的终端形式往往是以民间艺术来表现的。在当代西部民间文化的再生产中，民间艺术的地位似乎越来越重要，几乎所有的民间文化都需要民间艺术来粉饰。而且，只要能成为民间艺术的民间文化就能保留下来，就能发扬光大。不仅是因为其是能成为一个地方文化的象征、标志和符号，而且还因为其能转化成文化商品，是现代文化产业的最终成果。

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规律是，当一种文化还有生命力时，它是人们生活的指南，它存在于人们生活的背景知识中，所谓的背景知识就是人们在使用它，但却意识不到它，它溶化在生活中，与其成为一个整体。但当它不再能在当今的生活起作用，而失去了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时，它就成为一种遗产，一种表演展示的对象。

这一展示的表现模式为：

生活的日常器具、节日庆典、宗教祭祀的道具——民间艺术品——市场——现代人的家居、博物馆、美术馆。

节日庆典、宗教祭祀、人生礼仪中的歌舞——可以欣赏的表演艺术——市场——旅游表演，庆典表演、剧院、舞台表演——文化产品。

部分农民——民间艺术专业户——农民艺术家——文化商品牌。

非物质经济——旅游产业——文化产业。

于是我们看到的许多民间的和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在表演，他们在唱歌，他们在跳舞，他们在剪纸，他们在做各种手工艺品，他们在举行各种神奇的仪式……他们的文化不仅成为政府要保护的對象，也成为了当地重要的旅游资源。也就是说，民间的传统文化一部分随着传统的产业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而瓦解或消失了，但另一部分正在转化和重组，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文资源。在我们考察的西部，许多民俗的仪式和民间的歌舞及民间手工艺作为艺术的表现形式，不仅是保留下来了，而且还有所发展，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业。但是这些艺术形式背后的，与农民们的宇宙观、道德观、生命观、乃至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似乎正在碎片化、甚至空洞化。在这里面隐含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问题。

八、本土化现代性的实践

早期的人类学家普遍认为，在外来的更先进文化的冲击下，新的文化取代旧的文化是一种必然的规律。在克鲁伯 1948 年所写的《人类学》一书中有一段这样的话：“对于原始部落来说，文化接触引起的震撼往往是突然而严重的。他们狩猎的林地或牧地要么会消失，要么会因耕种出现而遭到破坏，他们古老的血亲复仇制度、猎头、献祭等习俗也会受到抑制。”⁵泰勒在其 1870 年所写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表明，欣赏文化差异性的方法，在于建构文化的进化阶段性。也就是说他认为人类的文化都是朝着一个既定的目标前进，原始人的生活就是人类生活的过去，而欧洲人则代表着人类整体文化所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也同样假定“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为工业较不发达国家，展示了他们的未来形象。”⁶沃特·罗斯托在其《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列举出了一个从“传统社会”到“高度大众消费的时代”的五个发展阶段的单线序列。在罗斯托的图示中，“传统社会”的解体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而外来支配也有必要，因为它能够实现这种有益的解体，否则传统生产的习俗关系会阻碍经济增长。在传统人类学家的眼里，只有传统的地方文化彻底解体，才会得到经济的发展，从而赶上发达地区的前进步伐。在他们的眼里，传统与变迁是对立的，习俗与理性也是对立的。

但时至今日，社会的文化背景发生了变化，人类学家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如人类学家萨林斯在书中写道：“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

⁵ 转引自：(美) 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2 页。

⁶ 同上。

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的对立观念。”⁷他以爱斯基摩人为例，认为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大规模的引进现代的技术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另一方面又在恢复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仪式庆典。同时岛上移民的出走并没有使他们的文化丧失掉，他们反之将传统文化扩展到像奥里根和加利弗里亚这样遥远的同宗的居住地。⁸

萨林斯的观点似乎给了我们的希望——那就是现代化的本土性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传统与现代未必会对立，保护与发展也可以达到一致。但如何做到这一点，通过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人文资源”概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于：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如今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地方，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文化遗产，正成为一种人文资源，被用来建构和产生在全球一体化语境中的民族政治和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同时也被活用成当地的文化和经济的新的建构方式，不仅重新塑造了当地文化，同时也成为了当地新的经济的增长点。因此，现在在世界的范围内，许多的民族文化以及各地的民间文化呈一种复兴状态，而这种复兴，就是传统文化的复活，但这种复活并不是在实用层面上，而是在精神层面的。它是作为一种昔日的精神家园给予人们的寄托，让人们在这里看到自己的过去，或领略到不同地域的人文风光，甚至成为一种可以欣赏的活的艺术。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一件文物或一种制度的功能可以变化，从满足这种需要转去满足另一种需要。”。从功能上来讲，它不再能从制度上物质上去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但它却能从另一个层面，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审美需求去满足人们的需要，这就是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能得到发展的根基，也是许多地方文化得以复兴的经济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中，传统人类学家所认为的，传统与变迁是对立的，习俗与理性也是对立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正如家萨林斯所认为的，“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许多地方正在出现本土化的现代性。

九、生态博物馆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也一直在思考这种本土化的现代性在中国的西部是如何在实践的，最典型的例子有哪些？通过研究觉得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把遗产作为艺术表演，作为旅游资源，建立各种的生态博物馆、民族园、文化生态村等等，都是一种类似的实践方式。

为了认真地研究这种实践方式，也为了寻求更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方式。课题选区了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作为解剖麻雀的研究对象。贵州的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中国与挪威合作创建的，其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亚洲的第一座生态博物馆。从1995年至今，该博物馆已创建了十几年，这是一种欧洲的经验在中国的实践。课题组希望能够对这一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有所研究和有所了解，因为它的实践对于当前的中国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中找到一条可行之路，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一方面保护好地方文化，另一方面又能激发地方文化的活力，还能实现本土化的现代性发展。这是课题组一直希望研究的问题，并认为，只要把这一案例研究清楚了，无论其告诉我们的是成功的经

⁷ (美) 歇尔·萨林斯著，王铭铭、胡宗泽译《甜蜜的悲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0年版，第125页。

⁸ 同上，第121页。

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一）、文化变迁的不同模式

变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人们为了应对自然生态的改变和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而所做的自主的变迁，也就是文化变迁的选择权和主动权掌握在文化持有者自己的手中。通过研究，我们看到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前，当地人虽然也有来自外界的迫力，如森林逐步消失，使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部分的狩猎生活；后来人民公社成立，为了记工分的方便，他们不得不学习汉族文化。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看到了他们非常自主而又智慧地将外来文化融入在自己文化的习俗中，也就是他们将外来的文化因素吸纳到自己的文化中，发展出新的民俗和新的传统。他们文化的主体性还很强大，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也还很自信。

另一种是没有自主性的，不得不为之的被动变迁，与其说是变迁还不如说是重构与重组。比如说，生态博物馆的建立，不是一种文化变迁的自然行为，而是在政府和专家的外来力量的支持下，使当地人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就从一个封闭的生活空间，来到了一个旷阔的，面向世界的全球性的空间。他们不容置疑，不容想象，必须要迅速地学习，迅速地脱离自己的文化传统，进入到新的时代，融入新的生活当中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看到的是自己文化的陈旧与落后和外来文化的先进与进步。于是，他们不但不会为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反而是自卑。他们不再自主的调适自身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而是全盘的否定自己的传统，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新的文化中。因为外面的世界和新的竞争方式在告诉他们，他们的传统文化已不合时宜，必须改变，甚至根除。

（二）、西方理论与具体实践之间的距离

在对贵州梭嘎生态博物馆的考察中，我们没有发现像萨林斯所讲的那样，人们一方面在大规模的引进现代化的技术和生活设施，一方面又很热衷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同时还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不被改变，我们所看到的是当地文化的迅速解体与断裂。为什么会这样？萨林斯提出的有一个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并非是金钱经济与传统生活方式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当不能够找到足够的金钱来支撑他们的传统生活时，大问题才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萨林斯所提出来的现代化的本土性，实际上还是要以经济为基础的，经济越发达，他们的传统文化越能保持下来，并且越能与经济的发展产生良性的互动。

生态博物馆如何能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并重，如何能做到既保持了本土的原有文化，又适应了现代化发展的需要？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博物馆的学者彼特·戴维斯说：“生态博物馆应该有一个过程来解决目标，它要记录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要由不同的项目来执行，要对文化和政治全面的介入，通过媒体展览、教育、游览、出版物等，来诠释当地的人文资源。现在欧美越来越重视对产出资源的诠释，生态博物馆应该积极参与这种诠释，通过媒体的传播，把所有的资源都纳入到其中，有许多意见输入的途径，在这一过程中要让各方面都对其具有拥有感（包括游客）。由于游客的介入，其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他这样的理念就是生态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本土文化介入现代化的一种方式。

但我们考察的梭嘎生态博物馆的现状是，这里没有专业的文化研究工作者，因此，谁来记录长角苗人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状况，以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还有谁来诠释当地的人文资源？谁来解释当地的文化？博物馆没有这样的专家，当地的民众没有这样的自信，也没有这样的自主能力。如果博物馆没有这样的专家，当地的民众没有这样的自信和自主能力。游客的介入，也许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但最可怕的也是会彻底破坏当地的文化传统。

挪威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还谈到生态博物馆的功能有三个方面：一方面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由此学会热爱他人；第二个方面，生态博物馆还和观众和旅游有关系，有很多东西可以展示，可以出卖，因此，其又是一个展示柜；第三个方面，它还是一扇向世界开放的窗户，如果不能成为窗户，当地的居民怎样和外边来的观众对话。如果达到了这三点，它的文化保护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可以同时得到解决。

在陇戛寨，我们看到生态博物馆的确起到一个展示柜的作用，因为他们在把他们的生活展示给了所有游客的同时，也在出卖自己的传统文化，包括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些物件；而且也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也是真正的从这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文化，认识了自己的文化。但他们看到的是自己文化的落后性，看到的是由于自己文化的落后而造成了自己的贫困；另外，它也的确是一扇通向世界开放的的窗户，在这窗户里，长角苗人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游客，也看到了自己与新时代的差距，与其他国家民族人们生活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急起而追之，要急切地摆脱自己的传统文化。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与欧洲的差距，欧洲生态博物馆概念最早提出来的时间是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正是其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转化的年代，这是欧洲的物质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准，但却面临着能源危机和生态的压力，在这样文化背景下的反思，使其产生了对文化与生态的保护思想，这是一种自发的文化自觉的行为。而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大都是建立在偏远的贫困山村，在经济没有达到一定的富裕程度，在当地民众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一定的自信和认识的情况下建立的。这种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或者只是为了在此名义下努力的摆脱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生态博物馆，很容易急功近利，其不仅难成为一种教育的工具，一种阻止文化退化的方式，还容易对当地的传统文化造成破坏。

十、研究的结论

通过大量的考察和研究，课题初步认为：一、在提出对西部人文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学者和文化政策的决策者要一定关注开发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设定政策前一定要对此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面对文化遗产，现在多数人只敢提保护，不敢轻言开发和利用。但是实践早就走在了理论的前面，文化产业、旅游业的发展就是这种实践的结果。即使我们提出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表面是保护，实质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发。

二、急需建立学术队伍，加强记录、梳理和研究方面的工作。我们在做西部人文资源的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当我们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抢救和记录。其实也许文化就是如此不断的向前发展的，我们

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让所有的文化都保持原态。但无论如何记录和研究确是不可缺少的，作为生态博物馆一定要有一个有关其所处社区的群体文化和历史的完整考察和记录，并且这样的纪录是经常性的、连续性的，把一个社区或族群文化的变迁过程全面地记录下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称其为生态博物馆。

三、通过研究我们认识到，即使在发达国家，文化生态区的保护也已经和文化产业及旅游业发展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其是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探索过程，同时也是将所保护的文化遗产对外展示的过程，而这种展示的本身就带有观光旅游的性质，也带有保护与开发同时进行的性质。这样的方式在生活富裕，民众文化自觉意识又很高的地区问题不大，但在一些贫穷落后，当地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又还没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意识的地区，尤其是也不具备有一支专门的学术队伍对保护区的文化作不断地作记录和研究的时候，我们是不能轻易建立生态博物馆或文化生态保护区的。

最后，通过七年时间的研究，课题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和认识：第一，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自然和社会是一体的。每个国家或每个民族都必须将生态的问题、自然环境保护的问题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都必须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节约利用放在首位，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要考虑这一问题。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在保护人类的精神家园，民族的文化认同，也是在保护传统的生态智慧，传统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与价值观。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在保护自然遗产，这两者应该得到相互促进，以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工作形成完整的互动。在自然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严峻破坏，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发生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偏向发掘民间生态智慧，民间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以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第二，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与现代是一体的。每个国家都会有自己传统的价值观、道德体系及与自然相处的经验，这是经历了千百年选择淘汰后留下来的人类文化的精华，在这样基础上所建立的现代文化必然是有其独特价值的，因此，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传统不会被否认也不会被丢弃，而是会汇入到现代，成为新的文化经验的一部分。而且一种文化如果没有传统就不会有创新，只会有学习与模仿。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缺乏原创性，就是因为我们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割裂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要想自主创新，要想让中国的文化重新崛起，就必须重新理解和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成为文化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保护其的过程，也就是我们重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过程，因而非物质文化保护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主创新是融为一体，同时并进的，不可偏废的。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就是在为文化的自主创新工作提供资源，提供认识。

第三，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文化与经济是一体的。一个国家无论有多么的大的财力，如果它只能向世界输出经济和物资，而不能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它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强国。美国、欧洲的强大都不仅仅在于它们的经济发达，还在于它们向世界输出了它们所认为的普适性的价值观，世界的全盘西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表现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而价值观的输入和经济的输入往往是一体的。中国也在向世界输出，但输出的大多是廉价的工业用品，

而且还出现了许多有关环保和食品安全等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泱泱的大国，已丢弃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又没有建立起自己鲜明的现代文化，也没有建立起值得世界认同的现代价值观。因此，在这样的时代，文化不再和经济无关，把文化仅仅看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一个不能向世界输出自己价值观的国家，就是一个没有文化品牌的国家，它所生产的永远是没有原创性的低端产品，经济发展的主动权永远在别人的手中，而不再自己的手中。因此，我们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不仅有利于中国文化价值的重建，也有利于推动当今中国经济的发展的。

以上这些观点皆缘起于遗产保护的意识，因为我们保护的不仅是自然遗产，还是自然生态，自然资源，还是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存在与互动：我们保护的也不仅是文化遗产，还是文化生态，文化资源，还有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与互动。任何文化与自然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也是一个的动态过程，其永远都处于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因此，保护必须要和发展相互联系，传统不仅连接着过去，也连接着今天和未来，是我们发展未来文化的根本与基础。而不是静态的，只需要我们保护的“遗产”。

只有在这样的理解中，我们才会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社会，人类的文化和人类的政治。因此，遗产的保护，资源的保护，不仅是一种专门的学问或知识。还是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方法论，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观，是每个公民都应该具有的普适性知识。这里面包含着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民间智慧，尊重地方性知识等方面的含义。

最后，我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高境界，就是让其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成为我们当今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我们当今社会肌体的一部分，也成为我们创立新的文化和新生活的基础。惟有如此，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才有意义，也才能不断地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同时也应该注意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应成为一场群众运动，也不应仅作为一场文化潮流，相反它应成为我国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一种模式，而对于普通公民而言这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换言之，我国现代化建设在拥抱现代科技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同时，也应尊重传统文化和为传统文化留下适当的和充足的发展空间，使仍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继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另外，我们还认为，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人类不可能再走工业化时代掠夺自然资源式的老路，同时，在世界未来的发展中，人类也不能再遵循西方物竞天择的斗争哲学，因为这样的斗争哲学，不仅是人类破坏自然的根源，也将会是战争的根源。在地球已经成为地球村的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能和谐相处，不然就会战争不断，恐怖主义事件不断。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随时都有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因此，人类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人与自然相处，人与人相处、人与社会相处，社会与社会相处的整体文化观与和谐哲学观。因而在这样的时代，中国人不仅要有环保意识，资源节约的意识。还必须重新发掘我们传统的和谐哲学，其中包括“天下一家”、“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物心合一”、“仁义礼智信”等等的思想。要是我们不发掘这些思想，不建立我们新的价值体系、道德体系与诚信体系，不仅我们没有了立国之本，在一切以物质利益为上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自然生态和自然资源会遭到破坏，我们的产品安全也没有保证，最终也会导致经济发展的受限制和自然灾

害的连续不断。其实现在这样的现象就已经出现了，许多假冒伪劣产品的销售，许多浪费资源的产品的生产等就是如此。因此，将斗争哲学转变为和谐哲学，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与社会的和谐，创造各种关系的互动与互赢，是我们不得不为的必然趋势。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是人文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终极意义。

而这所有的目标和意义都需要我们有强烈文化自觉意识，所谓文化自觉的意识，就是要在自觉认识自己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的基础上，尊重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任何唯我独尊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这也是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根本。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自己文化的优良传统，也要充分地尊重其他国家的优良传统，与其他国家和谐相处。以前我们总是说国家利益至上，而现在要说的是人类利益至上，在地球已经成为一个小小的地球村，当人类的行为已能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影响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利益都要以人类的利益为前提，不然我们就无法共同的在一个地球村中生活。

如果每个中国公民都具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意识，这样的“文化整体”观念，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这样的人文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理念，我们整个的国家就会得到改变。而我们如果能输出这样的以和谐为终极目标，以人类的整体利益为终极利益的价值观念，整个世界也会因此而得到改变。